

反對派政棍逃避罪責 虛偽自私醜態畢露



逃避責任的歪風，根本是反對派的基因。近日，林卓廷辭任民主黨副主席，陳志全辭任「人民力量」主席，更稱不會再參與任何遊行、集會、示威和參選助選；九龍城前區議員李軒朗離港，又辭任中大校友

評議會常委。反對派政棍辭任、潛逃的例子陸續有來。市民對於反對派政棍退出這個組織、退出那個組織，一點也不感到意外，反而會視之為香港由亂及治、重回正軌的重大利好信號。



陳克勤 立法會議員

反對派偃旗息鼓是不可逆轉的事實。自從去年中央出手通過香港國安法後，反對派的頭面人物明哲保身，陳方安生第一時間宣布退出政壇，可以說是聞風先動。但有一些嘍囉心存僥倖，他們當中或有人低估中央維護國家主權、安全和發展利益的決心，以為香港國安法只是個擺設；有人繼續企圖佔據議會席捲取政治、經濟利益。反對派的所謂「總辭」鬧劇就可見一斑，來回多次不知想辭還是不想辭，尷尬的醜態畢露於全港市民面前，最終全國人大出手，特區政府宣布四名反對派議員喪失議員資格。

天網恢恢疏而不漏

此後，事實證明，香港國安法雖無追溯力，但決不是「紙老虎」。參與或煽動前年黑暴的反對派

政棍近幾個月陸續被檢控判刑，反對派政棍才醒覺「出得來行，預咗要還」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，法治公義必定會追究他們反中亂港的罪責。

於是有人潛逃海外，羅冠聰、許智峯、梁頌恆等人先後離港，其他小嘍囉更各散東西。有30多人因觸犯香港國安法而成為通緝犯。除了國安法，反對派政棍更有其他問題，如梁頌恆「賴賬」，無視法庭褫奪其議員資格，要向立法會歸還93萬元津貼，後來被法庭頒下破產令；許智峯犯下其他刑事罪行，借海外開會的名義，一走了之，逃避刑責。這些反對派政棍一個個打着「流亡」的幌子逍遙法外。

回顧2014年，反對派煽動違法「佔中」時曾宣稱，他們發動「公民抗命」、「違法達義」，會承擔責任，即違法便要承認違法，「佔中」結束後會主動投案、承擔法律責任。這些宣傳聽起

來很「高大上」，一時之間誤導了部分市民，更吸引一些年輕人的注意和認同。

可惜沒多久，「違法達義」就原形畢露，鼓吹、煽動違法「佔中」的搞手如戴耀廷等人，遲遲沒有兌現承諾自動投案，遭人非議，後來被輿論逼得大緊，才提出只願意承擔「合乎比例的刑責」，同時煽動群眾向法庭施壓，「怕死」「走數」之情無所遁形。

違法「佔中」不僅開了不守法的壞風氣，還帶起逃避刑責的歪風。此後，就連戴耀廷本人也捨棄自首的言論，變成赤裸裸地破壞法治。到修例風波，違法暴力歪風更一發不可收拾。修例風波平息後，所有參與、煽動暴力者，只是想方設法逃避刑責，旁觀吶喊者則不斷美化暴力、助違法者開脫責任。若非中央及時出手制止暴制亂、做惡懲奸，暴力氾濫至風恐怕真的

會把香港拖入深淵。

佔據「道德高地」自欺欺人

但一言蔽之，反對派玩火圖謀「攪炒」，卻沒有人願意承擔責任，凸顯反對派一向爭奪、佔據所謂「道德高地」是自欺欺人。他們從來只顧自己的利益，不是真誠為國家好和香港好，連小小苦楚都受不了。正如他們經常被人嘲諷，只會犧牲別人的子女搞「違法達義」，卻從不會讓自己的子女「落場」。反對派的虛偽自私經不起時間考驗，市民必將看清他們的真面目。

反對派政棍的陰暗面暴露在陽光之下，市民認清他們以往鼓吹的「民主自由人權」「違法達義」根本靠不住，對香港百害而無一利；真正靠得住的，真正關心愛護香港的，是中央政府，這才是香港的堅強後盾。

利用「增強迴路」推廣疫苗接種

黃芷淵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港區全國青聯委員



有一種理論叫「增強迴路」。原理很簡單，先形成一個閉環，在推動力的作用下，閉環開始進行能量傳輸，一圈一圈增強，「果」再反過來增強「因」，循環強化，形成迴路。

舉例而言，有兩個班級。其中一名老師以身作則並以愛影響學生，班上好學生越趨增加，循環往復，整個班級正能量越來越多，這就是正向強化。相反，另一班的老師處處針對成績差的學生，成績差的學生被好學生排擠孤立，越趨區別對待，學生逆反心理越嚴重，師生關係越來越差，惡性循環形成負向強化。

至今香港疫苗接種率僅不足兩成。當局應利用正向「增強迴路」效應，透過「三步曲」鼓勵市民接種疫苗：增強信心、解決問題、創造誘因。

直面疑慮 曉之以理

「58歲女子死亡，死前18天曾接種復必泰疫苗」、「62歲男子呼吸困難去世，去世前25日曾接種科興疫苗」、「中年男及六旬婦同日倒斃家中，死前接種新冠疫苗」……這些是香港近日常見的新聞標題，儘管當局與專家不斷強調，暫無證據顯示死亡與疫苗直接相關，但不少人仍對疫苗存疑。如果死者死前不接種疫苗，是否就不會死？為何疫苗嚴重不良反應的個案間，有那麼多相似之處？

在捲入「疫苗政治漩渦」的當下，單靠重複呼籲「不應危言聳聽」、「疫苗可靠安全」是不夠的，這非但難以消除固執偏見與誤解，更容易弄巧成拙。

要增強市民對接種疫苗的信心，當局需直面市民疑慮，加強科普與解說，曉之以理。例如政府數據顯示，香港每日平均約140人去世，當中因缺血性心臟病、腦血管病及糖尿病而去世的平均人數，分別為

10.2人、8.1人、1.4人。多名專家都指出，疫苗接種計劃開始至今，香港每日死亡率並無明顯增加，顯示死亡個案與疫苗接種並無直接關係。

清晰指引 提供方案

特區政府以「疫苗氣泡」為基礎，有限度放寬社交距離措施。但有員工擔心不打疫苗會被辭退，有僱主憂慮難以勸服員工打針。當局要求不適合打針的顧客和員工要先取得醫生證明，更令醫生難下判斷。

當局應諒解業界，提供切實解決方案。例如，為醫生列出清晰指引，如有血壓、血糖、嚴重藥物過敏等指標與病史的人士不適宜接種疫苗。又譬如，透過機制處理僱員因健康理由不打疫苗而受到差別待遇的問題等。

破格思維 增強迴路

除了恢復本地經濟活動外，市民最關心的，是香港何時能通關，尤其是與內地通關。但通關不通關，需兩地政府共同商討，牽涉到國家或地區間的互認共識。

筆者建議，香港特區政府應進一步創造接種疫苗的誘因，例如設計好兩套「國際國內疫苗通行證」方案，一套針對與內地互認的機制，另一套針對海外「旅遊氣泡」的方案，以接種疫苗為前提，訂立包括抗體和免檢條件等標準，透過協同效應推動重啟兩地往來。

社會需要一種外部衝擊、破格思維，以增強迴路，打破既有思考框框。鼓勵接種疫苗是如此，當局推行政策和進行宣傳更是如此。至於迴路的增強，是正向強化，還是負向強化，則考驗當局的行動與判斷智慧。

發起「佔中」難逃法網

江樂士

香港回歸之後，若說有重大挑戰，則必非「佔中」莫屬。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汪洋表示，西方國家支持香港的反對派，試圖在香港發動所謂的「顏色革命」。西方媒體經常使用「雨傘革命」一詞，把「佔中」與在中東和東歐爆發的反政府暴力示威活動等同起來，正好印證了這一說法。後來，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辦法，反對派帶頭提請撤回決定，更要求公民提名以及時任行政長官梁振英下台。凡此種種，都是在挑戰國家權威，令中央忍無可忍。此輩名為民主，實為「港獨」，「佔中」由此成為2019年「港獨」的先頭兵。

在2014年高呼民主者與2003年試圖阻止董建華推行廿三條立法者，其實是同一批人，實為詭異。若當年廿三條方案得以落實，則中央在2014年公布的「831決定」無疑會對本港的民主意願多一分包容，對後任行政長官的愛國情懷則少一分強調。由此，泛民一直在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。作惡，就應承擔後果。

公眾滋擾屬普通法罪行，可判處7年監禁和罰款。當有人作出法律上不必要的行為，從而「危害生命、健康、財物，公眾舒適或阻礙公眾人士行使基本權利」，就會干犯此法。戴耀廷、朱耀明、陳健民及其同黨的所作所為已經構成公眾滋擾罪，此法如同為他們「量身定做」。

戴耀廷、朱耀明、陳健民3位在遵紀守法的港人社會中興風作浪、擾亂社會，局面迅速惡化、變得面目全非。裁判官陳仲衡在後期審訊時指出：戴耀廷煽動犯罪，「從受阻車道的數量、堵塞時間、參與者的數量及其對公眾帶來的痛苦來看」，其犯罪情節「非常

嚴重」。

違法「佔中」的9名頭面人物於2019年6月開始因為干犯多項公眾妨擾罪而在區域法院接受審訊，面臨法律制裁。誠然，此中或許有人欣然接受聆訊，覺得藉此可以博得「義士」的虛名，然而這些人很快就會發現，此舉代價沉重、不勝負荷。被告盡盡唇舌申辯，都是時時無補、違反憲法。但法官對上訴陳詞不屑一顧。法官麥禮智指出：「上訴人用了18個月策劃『佔中』，並且目睹了發生在添美道的情況，仍聲稱自己不知情、不存在串謀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罪，這種說法完全不可接受。」

之後在上訴庭，9位被告對原判提出質疑。為此，他們聘請6名大狀、11名律師的龐大隊伍，提出40多條上訴理由，結果還是無濟於事。他們指控法律條文模糊、範疇不清、違反憲法。但法官對上訴陳詞不屑一顧。法官麥禮智指出：「上訴人用了18個月策劃『佔中』，並且目睹了發生在添美道的情況，仍聲稱自己不知情、不存在串謀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罪，這種說法完全不可接受。」

法院駁回上訴。如果有人嚴重干擾他人行使基本權利，例如妨礙他人謀生，理應承擔法律後果。「佔中」不可能成功，這種試圖裹挾公眾的做法注定失敗。那些煽動「佔中」者不切實際，充其量不過是嘩眾取寵而已，他們又自私又愚蠢，對外國勢力唯命是從。只有贏得中央信任，香港才能實現選舉制度改革，可是泛民在2014年表現乏善可陳，不負責任，香港的民主化希望由此斷送，他們讓香港蒙受巨大損失，如今其頭面人物必當付出代價。

(作者是前刑事檢控專員，本文的英文版原文發表在英文《中國日報》，有刪節。)

讓出貨櫃碼頭 建住宅紓地荒



香港土地短缺問題日益嚴峻，曾有消息傳中央正研究在珠海桂山島填海借地予香港建屋，即時引來坊間熱烈討論，有民間團體及學者更提出，將葵青貨櫃碼頭搬到島上，除可釋放更多香港土地建屋，亦可增加港口競爭力。可惜特區政府未見有積極跟進。

身兼行政會議成員的新民黨議員葉劉淑儀，近日在立法會行政長官質詢時間舊事重提，指本港現時貨櫃碼頭供過於求，競爭力也不及內地港口，形容是「苟延殘喘」，認為香港可與大灣區整合貨櫃碼頭，將葵青貨櫃碼頭300多公頃用地改作房屋發展。特首林鄭月娥回應時稱，雖未有任何計劃用貨櫃碼頭用地建屋，但認同有關問題遲早要處理，因貨運業若一直弱於對本港並非好事。

葵青貨櫃碼頭於40多年前發展，當時選址偏僻，但隨着城市發展，已變成核心地帶，大量貨船出入為附近居民帶來嚴重污染，而且碼頭設施也面對老化問題，競爭力不斷在倒退。再者，本港海運吞吐量近年不斷下跌，全球排名已由昔日第一，下跌至去年的第九位，排名更在深州與廣州之後。貨量不足亦導致碼頭周邊的後勤用地有逾40%未盡其用，貨櫃碼頭的定位有需要重新研究。

除建議將貨櫃碼頭搬遷到桂山島外，團結香港基金早於2017年曾發表報

李梓敬

告，提出將葵青貨櫃碼頭遷往遠離市區、位於長洲南的人工島。報告指搬遷碼頭可以創造機會，對港口基建進行現代化升級，建設如新加坡大士港、上海洋山港的現代化設施，並藉此整合大灣區內各主要港口，增加競爭力。

團結香港基金更大膽建議，遷置貨櫃碼頭騰出的珍貴市區土地，可連同周邊的工業用地，以及政府建議的青衣南填海區，共同規劃發展，相關土地合共佔790公頃，這些土地坐落於市區核心地帶，交通網絡完善，絕對適合用作住宅及其他用途，以滿足經濟發展及民生需要。

其實早於2018年「土地大辯論」中，18個選項就包括「重置葵青貨櫃碼頭」及「葵青貨櫃碼頭上蓋發展」兩個選項。可惜小組最終報告中，未有將這兩個選項列入優先建議。反觀香港的競爭對手新加坡，早在2013年便公布將市中心南段的丹戎巴葛、吉寶、布拉尼、巴西班讓等多個貨櫃碼頭，搬遷到位於西邊的大士港，透過碼頭整合，增加港口效率及競爭力，同時釋放更多市中心珍貴土地作房屋及其他用途。

房屋政策為歷屆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。解決房屋問題日益迫切，期望現屆政府能參考採納更多意見，加快建屋步伐，讓市民能安居樂業。



邱國光 國史教育中心(香港)行政總監

香港新冠病毒疫情自2020年春節前後爆發至今已超過一年，學校間歇性停課、復課，校園節奏完全給打亂。隨着市民陸續接種疫苗，疫情似有緩和之勢，估計下學年大部分學生應可回復正常學習生活。

停課、停學期間，對學生影響最大的，表面上是學習進度，畢竟過去一年，學生上課的時數不及正常的一半，有些級別甚至更少。惟這不是一兩所學校的事，是整個教育界需共同面對，只要好好把課程調適，問題縱使不能馬上解決，影響也不會太深遠。一些深層次的問題卻不是這樣，問題就是深層次，自然不會太顯露，要發現也不會那麼容易，問題也只是慢慢地浮現；到為老師所識別時，問題已發酵了一段日子，要處理愈益困難，對社會的發展可能造成不良的影響，學生的學習差異就是一例。

學生天賦不一、成長參差、家庭背景各異，學習差異本是自然不過。為減低差異，教育上一般採取「正面歧視」以扶助有需要的同學。給與貧困生書簿津貼、平板電腦、遊學津貼等是典型的「正面歧視」方法，目的是盡量消弭學生之間學習上的不公平。學習差異是一光譜式現象，一端是因種種原因學習能力暫不逮的學生；另一端卻是資優生。

疫情下，這光譜兩端不斷延伸。一則是缺乏面授式學習，「教學干預」變得無力；再則是「正面歧視」發揮不了應有的功用，結果是學生只能靠自己及家庭。

學校的角色淡泊了，資優生、有能力扶助子女的父母，利用因停課而被釋放出的空間，可把子女提升至另一高水平。自學能力稍遜的學生，若來自社經地位較弱家庭，學習只能停滯，甚至退步。

敝司近幾年均舉辦「年度中國歷史人物專題研習比賽」，這兩屆參賽作品水平異常參差。比賽是小組形式，時段無論上屆或本屆均是在一月至四月進行，正正是學校停課的高峰期；加上限聚令，指導老師能做的估計不可能太多，但入圍作品的水平卻非常高。一位去屆冠軍學校學生，是屆再接再厲亦報名參賽；湊巧的，在另一次活動中與作者碰面，學生的爸爸向作者透露他兒子非常享受是次比賽，令他非常詫異的是其兒子看的材料竟是他大學時所看的論文！而他兒子只是一位小學六年級生！

真正的資優生學習與一般學生不一。一般學生需要的是「教師」，而資優生需要的卻是「輔導者」。資優生需要的是啟發及空間，而不是不停複習及耳提面命的教導。疫情下線上自主學習模式正好能讓資優生發揮所長；但這種模式讓大部分學生處於學習的劣勢；貧困生更因「正面歧視」失效而令學習滯後。須知一般學生是教育的主要對象，長期的學習滯後，會令彼等失去學習興趣，極端的結果就是逃學以至最終失學。追趕課程自然是後疫情時期的教學重點，但如何及早識別及扶助潛在失學危機的學生也是刻不容緩。

注意疫情對學生學習差異的影響

